

中国符号学丛书

从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中国首次探讨巴尔特话语符号学思想

作者追风先贤

演绎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

寻找思辨的立身之本与意义承诺

论巴尔特： 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

On Roland Barthes:
An Exploration of Semiology of Discourse

韩蕾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法国当代文论与古典诗学的关系”（16YJCZH025）成果

中国符号学丛书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中国首次探讨巴尔特话语符号学思想
作者追风先贤
演绎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
寻找思辨的立身之本与意义承诺

论巴尔特： 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

On Roland Barthes:
An Exploration of Semiology of Discourse

韩 蕾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项目策划: 徐 燕
责任编辑: 宋 颖
责任校对: 陈 蓉
封面设计: 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 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巴尔特: 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 / 韩蕾著.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5
(中国符号学丛书 / 赵毅衡, 唐小林主编)
ISBN 978-7-5690-2832-4

I. ①论… II. ①韩… III. ①巴特 (Barthes,
Roland 1915-1980) —符号学—研究 IV. ①B565.59 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2422号

书名 论巴尔特: 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

LUN BAERTE: YIGE HUAYU FUHAOXUE DE KAOCHA

著 者	韩 蕾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832-4
印前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1.5
字 数	379千字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6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四川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序

2008年我从台湾大学届龄退休，2010年回到祖国大陆服务，应复旦大学中文系之聘，担任特聘教授，履行的义务包括为研究生开授比较诗学的相关课程以及担任博士生导师。韩蕾是我于2011年招收的博士生，在我引导下进入符号学的领域，后以巴尔特为题，撰写论文，2015年获博士学位。2016年我回到台北，然而韩蕾和我一直保持学术上的联系。如今她大幅度修改过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有机会分享她的喜悦，并代言为序，可说尽到导师最后的责任，也为这段师生缘分画上完美的句点。

韩蕾原有法语基础，接受过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洗礼，这些条件多少有助于她进行学科史和比较文学“接受学”研究的工作，当时我认为她需要补强的是符号学的理论背景，尤其是结构语言学和逻辑学等分析方法的训练。2013年她开始写论文之前的养成培训经验主要就是随我阅读和讨论叶尔姆斯列夫、本维尼斯特、格雷马斯和巴尔特等人的著作，唯一逸出课题外的漫游大概就是因为她旁听我的“古典诗学”而需要重读柏拉图的《会饮篇》和《斐德诺篇》。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来，这段漫游的插曲也并非全属无心插柳，因为它让韩蕾追溯到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古典源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修辞术以及智者高尔及亚所宣扬的“大众意见”[δόξα (doxa)]和悖论(paradoxologia)。根据巴尔特的转述，柏拉图笔下呈现两种修辞学，但哲人偏爱的策略为搁置长篇大论的演说，践行互动式的话语交流，特别是苏格拉底和学生之间的精神引导(psychagogy)式对话，亦即巴尔特引述的拉丁修辞学所谓的“启教”作用(adhominatio)。师生双方讨论的伦理学题材驳杂不一，“哀乐思”(Éros)仅为荦荦大者，巴尔特称之为“爱欲修辞学”(la rhétorique érotisée)，其中所蕴含的“爱欲”被转换为智性的教育。熟悉《爱的言谈——片段集》的读者当能心领神会，若参酌为国内学界所忽略的《旧

修辞学（论记忆术）》（注：后文简称《旧修辞学》），另一历史面相和维度的巴尔特才能为吾人认知。容笔者就着修辞学的话题，由韩蕾的论文出发，顺便漫谈一下旅沪前后所见学术生态。

我特意挑出修辞这个看似冷僻的例子，目的是凸显韩蕾的论文在当前国内巴尔特研究论述场域中的特殊位置，希望读者能从这个角度切入，而得以见微知著。我这么做更能使读者体会这本论文的2.0版本如何具体完善了作者所企图建构的巴尔特话语符号学。我带韩蕾上课时，舍弃了汉语翻译，大多阅读英译本，若系法语材料——如本维尼斯特和格雷马斯，则尽可能地参阅核实原文，并鼓励她以英文撰写学术论文，出席国际会议，向世界一流刊物（如塔尔图大学的《符号系统研究》）投稿，她都做到了。我们这么做并非崇洋媚外，而是由于我深知在文学跨国接受史上“来源文本”被转码为“标的文本”后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突变，也因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经典”确认的障碍。这现象当然也会发生在英译本上，但语意值的质变程度相对要比中译本低。坊间部分中译者的外语能力值得怀疑，此外，出版业者为了经费和时限等生产因素的考量，往往找数人分工合译，对翻译作品的审查普遍不够严谨。下面举两个巴尔特中译本的例子说明。

我在前面指出《旧修辞学》被冷落，并非无的放矢。某出版社既然要发行多卷帙的中译本合集，势必要收入包含《旧修辞学》的文集。然而译者的知识结构薄弱，对符号学一知半解，对巴尔特当时的文化脉络理解不足，遑论古典学术，巴尔特在文中介绍的某些拉丁修辞学术语竟然在中译本里原文照抄，未给出中译，更无注疏，借口是：“对于少数专门读者来说，他们本来不需要阅读中译文；对于多数读者，满足了解‘大意’即可。”试问：你不提供中译，如何能让读者“满足‘大意’”？固然有人效法五柳先生，读书不求甚解，但译者不能把这个不求甚解的现象当作借口，自行免除了翻译的义务。笔者在台湾大学和辅仁大学指导过数本古典修辞学的博士论文，知道现成的中外修辞辞格对照词典不少。译者稍微勤奋一点，便能解决问题；结果是让“少数专门”读者自力救济——如韩蕾在本书所为（第160页），让“多数”读者自生自灭。如此不负责任，令人惊骇。对翻译向来关注的韩蕾显然注意到这个现象，她说：“即便在外语能力达标的情况下，由于对特定领域比如符号学知识的缺乏，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比如知识系统的错位等，可能导致他们原文阅读的效果要打一

个折扣。”她指的容或是读者，但也适用于率尔操觚，误导读者的译者。在这种被译者“霸凌”，不明原典真相的情况之下，一知半解的读者（包括研究生）只能随着所谓的专家信口雌黄。即使在符号学的领域里，我们常听到这样荒腔走板的“大众意见”：“现在索绪尔已经不流行了，当道的是皮尔斯！”“‘话语？’这不是福柯发明的吗？怎么到了巴尔特那儿？”

此类“大众意见”众口铍金，顽强地建构了我们的自我生产、自我消费的“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它竟然反讽地控制了学院，即便学院的职责正是苏格拉底主张的，以“知识”[ἐπιστήμη (episteme)]去破除“成见”（大众意见）[δόξα (doxa)]。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大众意见”变成了“出人意料的”[παρά? (para-)]“悖论”（paradox）。走笔至此，我要指出最近出版的一本巴尔特论的译者注的一个极为严重的“小”错误。2017年出版的《罗兰·巴特的三个悖论》，由二人合译，这本1989年出版的文论系巴尔特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弟子帕特里齐亚·隆巴多纪念先师之作，与符号学关系不大，有文学批评兼半回忆录性质。由书名可知，“悖论”显系关键词。按英语的“paradox”一字源出于古希腊文，由“δόξα (δοχείων)”（doxa “意见”）这个单词加上字首“παρά”（para- “之外”），仿佛“意见之外的意见”。

“doxa”在巴尔特的社会话语系统里居于核心位置，说它是一个主导性的关键词绝对不为过。韩蕾把它译为“大众意见”是正确的。据她说前人音译为“多格札”，这和某君“弃译”拉丁修辞术语半斤八两，直追20世纪初的“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思”先生。既然有音译，自然得有译注，译本第3页的译注1赫然是：“多格札，巴特自创的词语。”译者未查证，援用前人音译，或被误导以为它是专有名词。上文指出，此古典用语，源远流长，柏拉图至少用过两次，分见《城邦治术篇》（即《理想国》）和《泰阿泰德篇》。其词源是动词“我想”，“依我看来”，发展出名词“想法”。在《城邦治术篇》506c节苏格拉底把它视为“俗见”，和“知识”（episteme）对立，区分了诡辩家高尔及亚等人宣导的以辞害意、迷惑大众的“意见”和哲学家致力探索的“真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三卷（1404a1-2）略为翻案，把它纳入创制科学的正轨。根据第一人称动词词源，20世纪初的胡塞尔（1913）敷衍出“doxic cogito”“（主体的）自我意识”，为现象哲学概念。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

(1979; 1980) 承接胡塞尔，却把它转向落实到社会实践层次。巴尔特的用法介于两者之间，但向社会文化义涵靠拢。布尔迪厄生卒皆稍晚，他和巴尔特的学术生涯部分重叠，两人路数虽然不同，但都曾接受过索绪尔符号学的洗礼。巴尔特以“俗见”讨论现代社会神话和中产阶级阅读品位时，后面支撑的是长远的修辞传统。不了解这个背景，很难处理巴尔特的话语理论，此所以我俩当年坚持苦读《旧修辞学》。坊间译者学识不足，随意下笔（或弃笔），令人扼腕。

韩蕾在这本 2.0 版的博士论文里详细地梳理了前此遗漏的雅各布森和本维尼斯特的重要文献，填补了答辩版的若干观念及推论上的空白，使得前人索绪尔和后人巴尔特得以无缝接轨；她进而穿针引线，演练了“旅行”与“网络”两种纵横的修辞策略，借此重整了巴尔特全集，尽量做到巨细靡遗。历经了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和生产过程，一个学界前所未见的，形相成熟，生命力量充沛，发展与应用潜力无穷的“话语符号学”终于诞生、问世了。我为韩蕾喜，为中国学界贺。

张汉良

2019 年 3 月 16 日于台北市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学术传统与轴心问题	(1)
一、巴尔特“符号学”(sémiologie)的学术传统定位	(2)
二、从语言系统到话语:巴尔特符号学的演变历程	(8)
三、巴尔特在法国符号学传统中的特殊地位	(12)
四、巴尔特话语符号学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应用实验设计	(15)
第二节 本书的主体结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17)
第三节 本书写作相关文献述评	(22)
一、“巴尔特的/与话语符号学”研究的创新性	(23)
二、“巴尔特的/与话语符号学”相关课题研究综述	(26)
三、“巴尔特在/与中国”课题研究综述	(32)
四、对巴尔特作品中译本的评析与翻译符号学反思	(38)
第一章 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45)
第一节 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符号学出发	(46)
一、语言系统与言语的取舍:索绪尔语言学的“阵地”定位	(46)
二、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符号学与本维尼斯坦的语义学	(48)
三、巴尔特的“超语言学”设想对索绪尔的批判性继承与补进式 发展	(51)
第二节 雅各布森对索绪尔语言学的继承与发展及其对巴尔特的 影响	(59)
一、雅各布森对索绪尔语言系统与言语二分法的批判	(62)
二、雅各布森的话语交流模式及其衍生模式	(67)

三、雅各布森的失语症研究对索绪尔语言结构的深化	(72)
四、雅各布森转换词研究与话语分类思想	(78)
第三节 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研究及其对巴尔特的影响	(84)
一、从回归对言语活动的讨论走向话语语言学	(88)
二、陈述、人称与时态：本维尼斯特话语研究的核心	(92)
三、本维尼斯特对话语语言学、精神分析及符号学的通化	(99)
第二章 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对象领域、基本内涵与模式演进	(109)
第一节 从叙事话语结构分析看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理论雏形	(110)
一、叙事话语结构分析与超语言学的关系	(112)
二、叙事作品的语言系统与语言学语言系统之同质关系	(114)
三、话语语言学模式下的叙事作品层级分析	(117)
四、巴尔特叙事话语结构分析的内在逻辑演进	(126)
第二节 文学/历史两种话语的分析标记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发展	(128)
一、本维尼斯特话语语言学模式下的文学与书写概念	(129)
二、巴尔特对本维尼斯特“历史/话语”二分法的修订	(133)
三、德里达对本维尼斯特的批判对巴尔特的影响	(138)
第三节 话语语言学模型的完善标志着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成熟	(143)
第四节 模型对照：巴尔特的旧修辞学批判与新修辞学实践	(150)
一、巴尔特的旧修辞学研究的对象、目的与策略	(154)
二、旧修辞学的历时面向与巴尔特的共时性话语实践	(160)
三、旧修辞学的操作代码与巴尔特后设批评的理论体系	(171)
第三章 巴尔特自我反射式的书写对话语符号学的实践反思	(181)
第一节 巴尔特如何书写自我？论自传书写的新面向	(183)
一、自传书写的焦点变化与巴尔特的语言学模型	(183)
二、自传书写中的人称代词“我”消解生物“我”对书写的影响	(187)
三、《罗兰·巴尔特自述》作为后设自传	(191)

四、照片/镜子/灵魂:他者的发明	(194)
第二节 巴尔特爱之言谈中的互文性与主体间性问题	(200)
一、《爱的言谈——片段集》的文本特征与符号学阐释基础	(201)
二、爱之言谈的话语主体与共时文本问题	(204)
三、爱之言谈的双重主体:身体与语言的交谈与互化	(207)
四、《爱的言谈——片段集》作为想象界文本:论话语符号学与 精神分析的互通(一)	(212)
五、酷儿巴爾特的结构认同与符号壁龛困境:论话语符号学与 精神分析的互通(二)	(217)
第三节 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几个特殊应用	(222)
一、突破意义固着规约的“中性”话语理论与实践	(222)
二、作家风格的语言学、生物学与话语符号学面向	(234)
三、话语符号学视野中的城市话语分析	(238)
第四章 作为方法论的话语符号学对比较文学的模构:案例分析	(242)
第一节 话语符号学视域下的“巴尔特与中国”课题	(247)
一、论断主体/言说主体?从形象学到话语符号学的转向	(248)
二、一个传统的起点:巴尔特中国之行的历史文化背景	(252)
三、对巴尔特言说中国之能力与表现的模态考察	(256)
四、色情活动与政治文本:书写与躯体的整合	(266)
五、《中国》/中国:安东尼奥尼与巴尔特的语义场	(269)
六、个人私语:书写者风格与俗套话语之间的悖立	(274)
第二节 他山之石:洛特曼的自我交流模式与巴尔特对他者和自我 的再现	(281)
一、重述洛特曼的文化交流模式	(282)
二、巴尔特的他者书写与两种非语义符码	(287)
三、作为特殊符码的文化记忆和想象	(290)
四、巴尔特与卢梭的自传书写以及两种自主交流的模式	(293)
五、巴尔特与洛特曼两个符号学模式的比较:再论语言学的地位 问题	(295)

结论 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回顾与展望	(299)
一、“话语符号学”的界定	(299)
二、理论家与阅读者的对话：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理论系统作为一个建构的产物	(300)
三、书写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反思	(302)
四、巴尔特话语符号学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应用价值	(303)
五、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法国符号学史上的集大成者与新领域开拓者	(304)
附录一 罗兰·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相关大事记	(306)
附录二 2002 年版《巴尔特全集》目录补丁	(307)
致 谢	(318)
参考文献	(321)

导 论

第一节 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学术传统与轴心问题

何为“话语符号学”(sémiologie du discours)?为何要研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①而非其他人的话语符号学?是否存在“罗兰·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这一符号学类型?能否描述其内涵及发展历程?巴尔特对其话语符号学是否有理论反思与文本验证?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能否应用于分析典型的话语实践——文化对话?我们能否在比较文学方向下探视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应用?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发展前景怎样?以上是本书尝试要回答的一些问题。

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理论建构”意味着巴尔特本人并未给出关于“话语符号学”的系统性界定,笔者需要全面考察巴尔特在符号学领域的论述,进而尝试建立一套关于“话语符号学”的理论体系;“文本实践”则更倾向于表达一种科学实验的精神,笔者注意到,巴尔特在其1970年以后的书写中自觉地反思并补进了他的符号学思想,所以有必要对巴尔特的自我反射式的书写实践进行考察,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在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视野下,扩展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应用之可能性;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尝试就“罗兰·巴尔特与中国”这一文化对话命题,对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解释域、解释力及其边界进行分析。

然而,“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为何会成为一个特殊的、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呢?在导论中,笔者尝试解答这一疑问。

^① Roland Barthes, 本书行文统一将之译为“罗兰·巴尔特”;但对于所引用著述题目,则遵从原书/文译法,如《略述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等。

一、巴尔特“符号学”(sémiologie)的学术传统定位

本书的英文标题为 *On Roland Barthes: An Exploration of Semiology of Discourse*, 读者读之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 1969 年国际符号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Sémiotique)] 成立, 并创办了官方学报《符号学》(*Semiotica*), 加大力度进行学科建设, 向美国符号学创始者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 的“符号学”(semiotic 或 semeiotic) 研究倾斜, 学会创办者决定在“semiology”(sémiologie) 与“semiotics”(sémiotique) 之间取后者命名之, 自此, 大众意见一般倾向于以“semiotics”统一指代符号学科, 那么此处为何要用“semiology”而非“semiotics”来命名巴爾特的符号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回顾“sémiologie”的源起及其发展历程。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① 中, 初

① 目前, 学界公认《普通语言学教程》(译名参考高名凯中译本) 的第一个版本由索绪尔的同事巴利 (Charles Bally, 1865—1947) 和薛施葛 (Albert Séchehaye) 二人编纂而成。两位编者撰写的首版序言证实: 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索绪尔于 1906—1911 年间在日内瓦大学三次讲授语言学的学生课堂笔记, 但也配合了索绪尔自己的手稿札记; 这一版本的“教程”主要是以索绪尔的第三次讲课内容为基准, 同时对所有既有材料进行了重新组织。在这个版本中, 编者试图建立的有机整体并不是一个完备的整体, 比如索绪尔本人曾向其第三次课程的听众许诺过的“言语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de la parole) 缺失了, 语义学 (sémantique) 也几乎没有接触到 (cf. Bally, Charles and Séchehaye, Albert. Préface de la première édition.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 Ferdinand de Saussure. Paris: Éditions Payot & Rivages, 1995. 7—11.)。后来的学者, 如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1896—1982)、本维尼斯特 (Émile Benveniste, 1902—1976) 等人正是发展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缺失的“言语的语言学”部分, 从而引发了后来学者对“话语语言学”以及“话语符号学”的集中论辩。自《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一个版本出现以来, 学者对这个版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索绪尔本人的思想一直有所怀疑。学者鲁道夫·恩格勒 (Rudolf Engler) 考察了索绪尔学生的笔记, 对索绪尔的思想做了新的解读, 成其四卷本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校订本》(*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ar Rudolf Engler*), 于 1967 年在德国出版。恩格勒在其中对巴利和薛施葛版本所采编的学生笔记中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此后, 1993 年出版了索绪尔第三次课程的讲义, 这个讲义主要是根据埃米尔·康斯坦丁 (Emile Constantin) 的笔记编撰而来。康斯坦丁的笔记十分翔实, 学界普遍认为他的笔记再现了索绪尔课程更为深入的内容, 也是体现索绪尔后期思想的忠实证据。这份笔记中不仅出现了与 1916 年版本不同的信息, 也呈现了未曾在 1916 年版本中披露的信息。以上三个版本分别参见: (1)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Éditions Payot & Rivages, 1995. (2)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ar Rudolf Engler*. 4 tom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7. (3) Saussure, Ferdinand de.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1911) d'après les cahiers d'Emile Constantin/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0—1911)*, From the Notebooks of Emile Constantin. Ed. Eisuke Komatsu. Trans. Roy Harri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3.

步设想了一门新兴的科学：“符号学”（sémiologie）^①，并且认为语言学

① 现有三个版本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对“符号学”有两种界定。在1916年的版本中，“符号学”被界定为“在社会生活/生命中研究符号生活/生命”（“la vie des signes au sein de la vie sociale”）的一门科学（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33.）；在1967年恩格勒的《修订本》与1993年《根据康斯坦丁笔记编撰的索绪尔第三次课程讲义》中，“符号学”被界定为“在人类社会内部对符号及符号的生命所进行的研究”（“études des signes et de leur vie dans les sociétés humaines”）（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Édition critique par Rudolf Engler*, tome 1. 48；Saussure,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1911) d'après les cahiers d'Émile Constantin 71.）。由于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后两个版本更为准确地反映了索绪尔的思想，因此，笔者以这两个版本对“符号学”的定义为准。然而，从那些以首版为母本的英译及中文译中，我们也可以读到一些对我们理解“符号学”概念有所帮助的内容。我们首先请出首版中的“符号学”之定义：“人们因此可以察觉到一门研究社会生活/生命中的符号的生命/生活的科学；这门科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也从属于一般心理学；我们称之为符号学。”[On peut donc concevoir une science qui étudie la vie des signes au sein de la vie sociale；elle formerait une partie de la psychologie sociale, et par conséquent de la psychologie générale；nous la nommerons sémiologie (du grec sēmeton, « sign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33）译者们就转译这个定义，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我们就斜体部分语句，对比哈里斯（Roy Harris）与巴斯金（Wade Baskin）的两个英译本以及高名凯的中译本。哈里斯版本的译文如下：“It is therefore 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 science which studies the role of signs as part of social life.”（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Roy Harri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15），中文对应：“因此，我们可能发现一门科学，它研究作为社会生活之一部分的符号的作用。”显然，哈里斯的版本强调的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运作的科学以及被研究的“符号”存在于社会生活内部。巴斯金版本的译文如下：“A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life of signs within society is conceivable.”（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de Bask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16）中文对应“我们意识到了研究社会内部的符号的生命/生活的一门科学”。巴斯金版本更为强调符号性的生活/生命必须是在社会集体中。高名凯版本如下：“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38页）。我们将这三个版本集合在一起，正好应和了1967年与1993年两个版本中更为清晰的那个定义：符号学研究在人类社会内部进行，该研究的对象是符号及符号的运作。根据这一定义，我们的确能够清晰地将索绪尔的符号学归类为“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s）。事实上，在法语中，生活与生命为同一个单词“la vie”，高名凯的译本在翻译时刻意分别选择了“社会生活”和“符号生命”来翻译“la vie sociale”以及“signes de la vie”，倘若有一个译本将这两处法文对应译为“社会生命”和“符号生活”，是否依然有效呢？第二种翻译或也可成立。社会生命即为人的群体，符号生活是人类用话语（verbal）以及非话语（nonverbal）的信息与符码建构的生活。符号学显然包括了对人类群体的这些符号生活的研究。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解读这里的“符号学”概念：第一，这门科学研究符号的生命/生活。第二，符号学研究的符号是社会生活/生命的符号。从第一个方面，本维尼斯特回应道：对索绪尔来说，符号首先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它更多的是向人的以及社会的事实的规律延展；在这一领域里，在语言系统之外的系统与语言系统具有同质性（Benveniste, Émile. “Sémiologie de la langu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I*.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4. 48-49.）。在第二点上，本维尼斯特看到，索绪尔关于符号的认知，已经在语言学之外穿透进了人类的其他科学，但索绪尔关于“符号”（signe）的定义本身却阻碍了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有关索绪尔使用的“sémiologie”的词源解释，以及索绪尔为何弃希腊文“sēmeton”不用的原因的解析，可参见：《符号学与诠释学——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载于张汉良：《文学的边界——语言符号的考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9-10页。

[linguistique (linguistics)] 只是这门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索绪尔的定位中，这门科学是整体性地研究“符号诸系统”(systems of sign) 的一门科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French Structuralism)知识群体在“sémiologie”这一名义下，实则也处理了“semiotics”的问题。这一群体包括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等人。这些学者一方面承继了索绪尔语言学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与雅各布森等人的启发。然而，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决定统一“semiology”与“semiotics”并取用后者之后，法国学者巴尔特以及他的前辈马尔蒂内(André Martinet, 1908—1999)等人依然坚持使用“sémiologie”。

自“semiology”与“semiotics”分化以来，在前一领域的符号学研究中出现了两个彼此相反的趋势：一方将“semiology”局限为分析人工符码(artificial codes)、补充性符码(supplementary codes)等的研究，从而将“semiology”窄化至“语言系统”(la langue)^①的语言学之附属的地位^②；另一方以叶尔姆斯列夫、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2)

① 关于索绪尔语言学的三个概念“la langue”“la parole”“le langage”的翻译问题，我们有必要做一详细说明。张汉良在复旦大学教授符号学课程时指出：索绪尔所使用的这三个概念分别指示语言的不同面向，由于法语本身具有多义性，英语很难恰切地给予翻译，比如英文中没有与“la langue”以及“le langage”对等的词，因此，英译本多用了解释性的翻译。比如，巴斯金的英译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将“la langue”“la parole”“le langage”分别处理为“language”“speaking”以及“human speech”，而后来的哈里斯英译本则用复合结构“linguistic structure”来翻译“la langue”，将“la parole”译为“speech”，将“le langage”译为“language”。我们特别关注的“la langue”的翻译问题，哈里斯自己在其译本《译者前言》中做了说明：“事实上，人们已经尝试通过在不同语境中使用不同的译法这种手段，来指出与‘langue’这一术语相关的所有信息。‘the language’或者‘a language’这两个词通常是较为完美的英语译法，但是也有其他许多表述方式，比如‘linguistic structure’以及‘linguistic system’，后两者能够在英语中更为清楚地指出‘langue’这一术语的内涵。”(Harris, Roy.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y Ferdinand de Saussure. Trans. Roy Harri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F48.) 关于索绪尔这三个概念的中译，我们沿用了高名凯的“语言”“言语”和“言语活动”的译法。但是，由于索绪尔“语言”概念有其特殊的指涉，而在一般读者这里，容易将之与指代自然语言的“语言”所混淆，因此，本书倾向于以“语言系统”来翻译索绪尔的“la langue”，用以与自然语言相区别。

② Greimas, A. J. and Courtés, Joseph.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Paris: Classiques Hachette, 1979. 336. 笔者也参考了该书英译本，参见：Greimas, A. J. and Courtés, Joseph. *Semiotics and Language: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2. 282.

和巴尔特为代表,发挥了索绪尔的“semiology”,覆盖了对“言语”(la parole)和“言语活动”(le langage)领域的符号运作及其规律的研究。格雷马斯和巴尔特同为叶尔姆斯列夫的私淑,他们二人学习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glossématique)的成果,分别是《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 recherche de méthode*, 1966)和《符号学基础》(“*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 1964)。叶尔姆斯列夫沿袭了索绪尔的术语“sémiologie”,但对之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规划。他将“sémiologie”确立为一种具有科学性的后设符号系统理论,即“后设符号科学”(méta-sémiotique scientifique),其对象符号系统并不自成科学。叶尔姆斯列夫又在“sémiologie”之外分裂出“内涵符号学”(les sémiotiques connotatives)以及有自成科学的对象符号系统的后设符号学系统理论^①。

罗兰·巴爾特的《符号学基础》虽以“*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命名,实则突破了叶尔姆斯列夫的规划,或者更恰切地说,他着力发展了内涵符号系统,以“sémiologie”之名统摄了叶尔姆斯列夫的两种“后设符号科学”以及“内涵符号学”。自20世纪50年代起,巴尔特已经自觉地进入了符号学领域,而他在这一领域中的大众神话(les mythologies)分析(也是对大众话语的分析)在沿袭索绪尔的传统之基础上,又接受和回馈了叶尔姆斯列夫的再规划。《符号学基础》发表于1964年第4期的《交流》(*Communications*)杂志“符号学研究专刊”。巴尔特在为该期杂志撰写的《引言》(“*Présentation*”)中,开宗明义、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索绪尔符号学的核心命题之一——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然而,由于索绪尔是在其以语言系统为对象才能确立的语言学基础上创立了符号学,其符号学的基本单位“符号”(signe)也奠基于“语言符号”(signe linguistique),因此他的符号学是以语言系统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de la langue)为基本模式的。巴尔特在《引言》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文化是以语言言说/陈述而来的文化,与言语活动交织在一起,要研究人类的言说行为及其生产的话语文本,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必须要被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模式取代^②。巴

① Greimas and Courtés,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336; Greimas and Courtés, *Semiotics and Language: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282.

② Barthes, Roland. “*Présentation*.” *Communications* 4 (1964): 1-3.

尔特在《引言》中将对索绪尔语言学与符号学关系的逆转，及其在《符号学基础》中对叶尔姆斯列夫内涵系统（connotation）的吸收融合在一起，成功地在索绪尔“sémiologie”传统下发展出一套既包含索绪尔符号学，也容纳统一后的叶尔姆斯列夫内涵系统符号学的新符号学。通过正文的讨论，笔者将会证明，这一套符号学正是他的“话语符号学”。

至1969年，法国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应国际符号学会官方刊物《符号学》主编邀请，为首发卷撰文，以《语言系统的符号学》（“Sémiologie de la langue”）一文向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正是索绪尔的“符号”概念阻碍了符号学的发展。然而，有趣的是，本维尼斯特援用的是索绪尔的术语“sémiologie（semiology）”，而非学会和刊物所选用的“sémiotique（semiotics）”。在这篇论文中，本维尼斯特将索绪尔的符号学命名为“语言系统符号学”（sémiologie de la langue），包括研究意义之封闭指涉的“符号学”（sémiotique）（或“符意学”）和研究意义在开放语流中指涉的“语义学”（sémantique）。本维尼斯特又以对“陈述”（énonciation）的研究作为话语研究的后设路径，开发出陈述语义学（sémantique de l'énonciation）^①。本维尼斯特特别指出：语义学使得我们认识了话语（le discours）的意指性（signifiante）的特殊性，而陈述语义学作为一门后设语义学（méta-sémantique），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与解释在初度意指系统之上进行二度意指而得以建立的内涵系统的符号现象及其运作规律。可以说，本维尼斯特厘清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符号学，一并在索绪尔搁置不谈的言语、话语层面发挥出了话语的符号学，他延续了“sémiologie”的传统，同时将“sémiologie”扩展为包括符意学、语义学以及陈述语义学在内的新符号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表于国际符号学协会官方杂志《符号学》上的《语言系统的符号学》一文其实暗藏了本维尼斯特弃“semiotics”而取“semiology”的主张。

在索绪尔之外，巴尔特终其一生最为热爱的语言学家正是本维尼斯特^②。他接受了本维尼斯特对“陈述”、“交谈”（interlocution）、主体性（subjectivité）、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等语言学问题的研究，也吸

① Benveniste, “Sémiologie de la langue” 43-46.

② Barthes, Roland. “Pourquoi j’aime Benvenist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2. 515. 注：此文为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二卷）》所作，原载于1974年4月16日的《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